

12-2018

## 前言

Gang XU

嶺南大學中文系, gangxu@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徐剛 (2018)。前言。《嶺南學報》，復刊 第十輯，頁1-8。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0/iss1/1](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0/iss1/1)

This 前言 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前 言

受主編蔡宗齊教授的委託，《嶺南學報》第十輯由我負責編輯。爲了編好這一輯，我們經過了將近一年的籌備，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在嶺南大學召開了以“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爲主題的小型會議。本輯的論文，主要來自這次會議。

我想，作爲現代學術的中國古代文史研究，是從民國時候的羅王之學開始的。現代文史之學的開拓和進展，一直是跟出土文獻的發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民國時候的諸多大師，都非常強調新材料的發現和使用。中央研究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是以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爲支柱的，從此纔有了中國現代的考古學。20 世紀下半葉以來，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秦漢以前的早期中國社會的認識，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由於出土文獻內容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把各個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者吸引過來，形成了一股浩蕩的沿流(drift)，奔流成河。

這是一個學科重組的時代，很多傳統學科的邊界都已經模糊，面臨着與其它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研究者相互之間的合作和交流顯得越來越迫切。出土文獻涉及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它本身就是一個學科開放的研究對象，尤其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之間的切磋和協作。本輯的十二篇論文，雖然只是這條大河中激起的幾朵浪花，但是它們各有自己的姿態，各有自己的衝擊力，從不同的側面，突顯了出土文獻研究的特點和現狀。

這十二篇論文，可以分爲三組。

第一組是“語言文字考釋”，包括六篇論文，大略按照時代順序排列。杜清雨先生的《說甲骨文的“𠄎”和“𠄎”字》考釋了“豕”和“髡”兩個甲骨文字。甲骨文的研究發展到今天，除非有新材料的佐證，否則文字釋讀的難度越來越大。杜清雨先生從攻讀碩士學位開始，就一直鍾情於甲骨文字

的釋讀，他的碩士論文《甲骨文字說四篇》，就有不少很好的意見。畢業之後，他到中華書局工作，業餘時間，繼續堅持甲骨文字的研究，非常不容易。這篇文章，是他堅持研究的新成果。文章有理有據，所下結論也頗可信，很有參考價值。

沈培先生的《新出曾伯雋壺銘的“元犀”與舊著錄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是對新出青銅器曾伯雋壺銘文“孔武元甯”一語的考釋。正如他一貫的風格，通過一個點聯繫到相關的問題，對其他跟“甯”字相關的銘文一併作了統一的解釋；更讓我感到有意義的是，他進一步分析了“孔 A 元 B”這個語法格式的特點，反過來又發現了金文中的“鳴”字的新義。這種從具體問題到探索規律，從探索規律到發現新的具體問題的反覆尋繹的過程，真是我們研究學問的大快事！

鄧佩玲先生的《新見〈壽罍尊〉銘文所見“馮”字試釋》一文，也是對新出青銅器銘文語詞的考釋。文中所考的壽罍尊見於 2017 年香港翰海秋季拍賣會，銘文記有“賜（錫）馮馬卅匹”一語，當中，“馮”字从“卜”从“馬”，乃金文首見。鄧先生結合先秦用馬制度，將此字讀為“駁”，“賜（錫）馮馬卅匹”意指賞賜雜色馬三十匹。鄧先生的釋讀很有啟發。我曾在會議上提出讀為“朴”可能更直接，因為朴有公牛之義，從卜從馬者為公馬，從卜從虎者為公虎，從卜從豕者為公的野豬，似乎也都能解釋。不過，鄧先生並不認同。我的意見也的確只是推測。可見語言文字的考釋雖然是基礎工作，但要取得精確不移的結論是多麼困難。可能越是基礎的工作，越需要我們保持開放對話的心態。

文字考釋，尤其是戰國文字的考釋，是趙平安教授最擅長的。他這次提交的論文是《談談戰國文字中用為“野”的“冶”字》，將戰國文字中從“土”從“爪”的字論定為“野”，從來源上講，很可能是冶的假借改造字。這個結論，應當是非常可信的。

陳劍先生的《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又一次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範例：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現象，其實是誤會。以前我們從不置疑的“懸諸日月而不刊”，原來應該是“縣諸日月而不刊”。他舉了大量的證據，解釋了“縣”與“懸”在字形上的關聯，以及各種相同或相似的文例，令人信服。這個結論很有顛覆常識的衝擊力，以至於我一開始很難相信；但是認真閱讀他的論文之後，我覺得我還是傾向於他的新說。

近些年來，在出土文獻研究中發現了很多似乎難以用傳統的古音系統

來解釋的通假、諧聲現象，這些都是研究上古音的珍貴材料，很多學者對此有過總結，也有些古音學家據此來構擬新的古音系統。不過，新材料也帶來了很多新的認識上和實踐上的混亂。張富海先生的《諧聲假借的原則及複雜性》，想要重新確認一些通假、諧聲的原則問題，很有意義。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開了一個討論出土文獻與上古音的沙龍，我有幸參與其中。我在會上發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有些正好涉及張先生的論文內容，且容我不揣譾陋，略述一二。

上古音的研究需要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具備歷史比較法的基本觀念與方法，這是毫無疑問的。歷史比較法的基礎是語音對應規律，其關鍵並不是兩種語言的時間早晚，祇要能找到語音對應規律，相差多久的語言都可以比較。但是，時間相差越遠，同源詞的選定就越困難，語音對應規律也越難以建立，這也是常識。

目前講的上古音，從西周，甚至商代，延續到秦漢，時間跨度太長，內部肯定經歷了很多變化，把它分成幾個歷史時期是很必要的，但問題是，缺乏材料。出土文獻雖然提供了一些，但基本都是戰國秦漢的材料。最理想的當然是拋開清人已經建立的古音體系，拋開《詩經》、《楚辭》的音系，單獨從現有的材料出發去構擬，然後跟已有的古音體系比較，肯定能有大的突破。但問題是現有的出土材料雖然字數很多，卻尚不足以單獨構建戰國與秦漢的古音體系，不知道安徽大學的《詩經》簡的情況怎麼樣。這也跟材料的性質有關。出土文獻中的古書部分，首先要確定它的寫作時代，然後要確定它的抄寫年代，纔可以進行這種歷史研究。但是戰國竹簡，它的內容卻未必是戰國的，除了一部分可以大致確定，很多其實是筆糊塗帳。例如：《金縢》，是西周的，還是戰國的？《易經》，恐怕不能反映戰國時代的音系，它肯定要更早些。《保訓》，是戰國人創作的小說，還是西周時代流傳下來的文本？戰國文字書寫的文本是否反映戰國時代的古音系統？對於古書來說，恐怕是更早的，至少有更早時候的語音要素；倒是文書類的文獻，比較能確定它的時代，如果出現假借或者押韻現象，比較可靠。而且，要研究諧聲字反映的音系，也要先知道這個字產生的時代。這些都值得討論。

當前的上古音研究，恐怕還沒有達到能夠重建一個新體系的地步。目前最大的困難可能有三：

第一，是某些研究的出發點是否可靠。例如諧聲字、假借字，到底是不是完全同音，還是相似就可以？如果是相似的話，究竟達到怎樣的相似纔

可以？比如說，是否要求諧聲或假借必須聲母相同？相近可以嗎？同部位或發音方法相同可以嗎？發音部位和方法不同但聽感上相似可以嗎？

這方面的問題雖然難解決，但還不是最難的，因為我們可以從一個假定出發，各自幹各自的，能自圓其說，也可以成爲一個有參考價值的體系。

難的是第二，是具體的例證是否可靠。對於出土文獻的解讀，目前還有很多問題，看到異文，並不見得一定是語音上的問題，有的是語義相近產生異文，有的是傳聞不同造成異文，有的是文字使用上的習慣。例如楚文字的“倉”和“寒”，恐怕跟語音沒什麼關係，就是形近或者義近；“只”跟“也”，戰國文字相似，有混用的，就不適合用作支和歌通假的例證；“天”跟“而”（日母之部）混用，字形大多沒有分別，但語音毫無關係；“名”用爲“明”，看戰國文字，兩者字形很接近，恐怕是誤混，不見得是耕部字假藉爲陽部字；藝、設、勢、褻的假藉，恐怕也不是聲音上的通假，而是字形上的借用。大恒與太極，語音雖然相近，但可能更多的是因爲意義上比較接近。

語氣詞的用字往往有不同的形式，現代漢語也是，嘛、嚶、麼表示的是同一個語氣詞，但是看到這幾個字，很可能我們會念成不同的讀音。如果用語氣詞的氏、可、兮的不同寫法，來證明歌部、支部的通假，說服力也要大打折扣。

漢字的特點跟拼音文字有所不同，出土文獻中經常用同一個諧聲偏旁的字表示本字，例如釀、攘、囊、壤這些字，在出土文獻中都可以用“襄”一個字來表示。當我們看到“襄”的時候，漢字的特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其它從“襄”之字；再根據上下文，得出正確的讀法並不難。這種材料，能否得出“襄”用爲那些字是同音假藉？能否得出心母與泥母可以通假的結論？我們最多可以說，泥母的“囊”用心母的“襄”諧聲，但是通假就是同時代的，諧聲未必是同時代的，而可能反映不同時代的語音變化。兩者很不一樣。而且諧聲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構擬一個 sn 這樣的聲母？

我們對於出土文獻的釋讀是否可靠，也要警惕。文字本身的問題還不是最麻煩的，就算認出了所有的字，怎麼斷句，怎麼解釋，往往有很多可能性。目前的上古音研究，經常是取有利於我的解釋，把這樣的解釋當作是正確的解釋，來支持自己的分部或構擬，這樣的結論當然難以令人信服。一個比較可行的做法是，逐個檢驗例證，把那些幾乎是確定無疑的作爲一類證據；把那些只是可備一說的例證作爲二類證據，只是作爲參考；那些基本上不能成立的例證，當然就直接排除。這樣做成一個表格，以供古音研

究者使用並檢驗。

第三,是例子的數量。王力先生說,例不十,法不立。這是對例證的可靠性的一種保證。例外必須有一定數量,纔有可能找到例外的規則,纔能成爲一種語言現象,祇有一兩個例子,那完全可能是語言以外的因素,比如抄寫錯誤,偶爾用錯,理解偏差等等。比如幽侵對轉(包括宵談)的問題,王念孫等清代學者也注意到了,他們把“三年導服”的導,讀爲禪。但是這樣的例子太少,所以王念孫從來沒有用這樣的例子來調整他的古韻分部。唐蘭先生用這個例子來考釋甲骨文中的稻字,並且明確說,甲骨文的音韻,不能總是用《詩經》的韻部來衡量,這是對的,可惜的是不可能有條件重新構建甲骨文的韻部系統,甚至該怎麼修正也不知道,這是例子太少的緣故。後來例子稍稍增加,裘錫圭先生有專門的文章討論。現在的古音韻部系統,任何兩個韻部之間,幾乎都可以找到幾個相通的例子,怎麼解釋,各家有不同的看法。段玉裁特別強調之、支、脂三部的分立,但現在從出土文獻的角度看,之、微有相通的例子,傳世文獻上也有一些之和脂相通的例子,怎麼處理,還是跟數量有關。如果祇根據幾個例子,例外的規律是難以找到的,也就失去了分立的根據。月部和葉部,魚部和談部,真、元部和耕部,東部和陽部,等等,都有類似的情況。段玉裁自己曾說,知其分纔能知其合,知其合纔能知其分,這是處理常例和變例的微妙之處。

不過,也許正因爲有這麼多的困難,古音學領域將是一個大有可爲的研究領域。目前,對於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越來越深入,隨着出土文獻材料的豐富,加上原有的傳世文獻,這三重證據,很有可能爲理論語言學和上古音研究打開一個新局面。

本輯的第二組是“歷史與文獻發微”,包括五篇各有特色的論文。前兩篇是談歷史的,後三篇主要是文獻。我們這裏用“發微”這個詞,不僅是發現新的隱微之義,也含有以小見大,從非常具體的問題來探求歷史背景的意思。

郭永秉先生的《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對戰國文字資料中與斟量器物有關的“孺子”的身份再次進行了探討,否定了過去對三晉銘刻中所見的部分“孺子”身份的判斷,認爲這些“孺子”是工官中負責諸如器物檢定斟量等輔助工作的成童。論文材料翔實,很有創見。郭先生對“孺子”的研究,在研究的思路上也給我啟發。

這篇文章是對他幾年前研究“乳”字的工作的推進。他在文章的開頭說：“六年前，趙平安先生和我協力分別對戰國楚系與三晉文字中的‘乳’字進行了較為全面徹底的考釋清理，基本構建起古文字‘乳’字的演進序列，發掘出一批戰國文字中的‘乳（孺）子’資料。”“古文字字形考釋只是古文字研究的第一步，疑難字釋定之後，還需要對這些字在相關語境下的用法、含義甚至有關語詞在歷史、制度等方面的意義作出合理闡說。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乳’字的考釋，在今日看來確實是不盡完美的。”“我的那篇小文發表後，陸續又見到若干關涉‘乳（孺）子’的材料，通過新資料提供的新知，使我對戰國時代與工官有關的‘孺子’這一身份，有了進一步比較明確的認識。”我覺得郭先生先後研究“孺子”的論文，很有裘錫圭先生的風範。

韓巍先生的《新出“宗人”諸器所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是對一組新見的流散青銅器的研究。這是一組與名為“宗人”的貴族相關的銅器。韓巍先生分析了其中的人物關係，試圖揭示宗法制度的某些具體的細節。他的這一研究，無疑會深化我們對於西周宗族關係和宗法制度的認識。

陳侃理先生的《司馬遷與〈過秦〉篇》，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論文，他想探索的是司馬遷的寫作心態和個性。我把它概括為“用經學的方法來研究史書”，也就是探索史書作者的微言大義。不知道作者是否能同意我的這個概括。其實在傳統的史學研究中，研究一個歷史人物說話處事的具體情境，由此推測他的心志，是佔了很大分量的；只是具體到史書作者的微言大義，我們往往會覺得那是孔子的春秋筆法，仿佛那是帶有巨大任意性的以意逆志。不過，陳先生的論文是以堅實的史料為依據的，他的探索也是有說服力的。我個人在讀《史記》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感覺，似乎能見到司馬遷的音容笑貌。當然，這也可能是一種錯覺，但是這足以說明，司馬遷是隱藏在他的作品之中的。如何讓這位偉大的史學家重現在陽光之下，無論如何，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問題。

林志鵬先生的《戰國楚竹書〈容成氏〉校讀》，是對上博簡《容成氏》的再次整理。對於《容成氏》已經有大量的整理研究的文章，我雖然孤陋寡聞，也知道至少已經有孫飛燕女士和單育成先生的兩部集疏性專著。這種匯聚舊說，又有所新見的著作，可以大大方便我們研究者找尋資料，實是功德無量之事。在這樣豐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能有新的發現，實屬不易。我理解，林先生的這篇文章，目的並不在於匯聚眾說，而是想在眾說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判斷，整理出一個可靠的可供學者閱讀和研究的本子。

這種工作，較之集疏性的著作，簡明扼要，也可以節省讀者的很多時間，也是功德無量之事。

楊華先生的《中國古墓為何隨葬書籍》，是一篇介於考古學、文獻學與思想史之間的論文。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雖然前人已經多有討論，但楊先生的答案仍然獨具特色，他認為其中有一個觀念變化的過程：在喪葬禮制的初期，書籍被埋入墓中，可能與墓主的身份、職業、興趣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相沿成俗，便變得關係不大了，僅僅退化成一種程序，大多是舉喪時臨時抄寫的文本。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而只是在是否隨葬了“書”。楊先生的答案的確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墓葬中出現重複文本、摘抄選抄、補綴書寫、空白簡等。他的解釋很值得參考。

本輯的第三部分，是“史與思之間”，是筆者的一篇思想史方面的論文。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較少思想方面的研究，這跟我自己缺乏組織會議的經驗有關。有些非常優秀的學者，特別是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學者，未能及時邀請，這讓我們會議主題中的“思想”這一部分，顯得有些孤獨。我想以後有機會再組織一些聚會，做一些更專題化的交流。

很早以前，我就想寫一篇考察“中國”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的文章。但是真正動筆時纔發現，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遠不是單單考察一個概念那麼簡單。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討論越來越多，尤其是考古學界關於“最早的中國”的討論，已經成為熱點問題。不過，目前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哪個是最早的中國？夏文化在哪裏？“中國”這個觀念是連續統一的存在，還是一個想像的概念？等等。而對於早期“中國”這個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卻鮮有討論。我的《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就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文章用的主要是文獻的材料，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也參考了考古發現和考古學家的意見，論述了早期中國的地理格局和政治中心的變化，嵩洛地區是如何從一個邊緣地帶變成天下之中的，如何因此形成“中國”的概念。有關“中國”這個概念，還有很多相關的問題需要研究，這將是我今後要繼續關注的課題，本文只是邁出的第一步。

以上是我對每一組論文的主旨和每一篇論文的介紹。限於個人的水平和見識，所言不一定都合適，僅供讀者參考，也歡迎作者批評。

最後，作為本輯《學報》的執行編輯，我需要感謝很多人。我們的會議可以說取得了圓滿成功。首先要感謝前來參加會議的各位學者，他們雖然



都很年輕,但早已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願意前來參加會議,並且提交了高質量的論文,這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我也要感謝《學報》主編蔡宗齊教授和系主任汪春泓教授的信任與支持。這是我第一次組織會議,雖然規模不大,卻真有點手忙腳亂;如果沒有他們這兩個強大的後盾,無論是會議還是本輯《學報》,都不可能順利完成。還要感謝我的前輩同事李雄溪教授和許子濱教授給予的意見和幫助,感謝所有幫忙張羅會議和參加編輯工作的嶺大同事和研究生。我還要特別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沈培教授,對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似乎都沒有拒絕過。

我們的會議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卻得到了學界和學校的高度重視。香港的兩位前輩學者單周堯教授、張光裕教授蒞臨我們的會議並擔任主持。時值嶺南大學復校 50 週年紀念,校長鄭國漢教授也到會並致開幕詞。校長說:“學校特別重視文史研究的進展,因為這曾經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傳統。”祝願嶺南大學中文系,永秀於學術之林。

徐 剛

2018 年 8 月 7 日